

安全知识的剩余：知识生产制度“最小保护”运作中的判断力不发生

作者 张琼 · SDE 学员 · 约 2.6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8月2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本文提出“被动判断”与“剩余经验”这对核心概念，将中国知识生产的深层困境从“主体被制度压迫”的既成对象论诊断，推进到“判断主体如何在工序中被逼出”的发生学分析。既有“回收论”虽比“依附论”更锋利，却默认了研究者的判断胆量与经验感知力乃是先于制度而存在的品质。本文揭示了一个更根本的机制：制度压力之所以能系统地使研究者的判断力不发生，不是因为压力够大，而是因为研究者的判断主体性本身从来就不是先于制度的内在禀赋。在安全知识的生产工序中，研究者被卷入那些安全知识无法完全覆盖、却必须被亲身承受的“剩余经验”——那些令自己不安、困惑、躁动、拒绝被任何现成概念收编的材料——从而被强迫地、被动地发生出一种切断旧有安全知识的、临时的、并非自己主动选择的判断力。本文将其命名为“被动判断”，并论证这才是解释性社会科学知识得以发生的真实起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解剖了三条常被误称为“绳索”的保护律令——“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并将其重写为“最小保护”操作：它们不是在硬性地“禁止”判断，而是通过最小化研究者在工序中承受剩余经验的时间与烈度，使其难以进入被动判断的发生条件，从而让安全的经验处理显得“够用”且“唯一可行”。在此框架下，逆行者不是“顶着压力说真话”的悲壮英雄，而是那些在特定的工序裂缝与生平卷入的耦合中，被卷入更深的剩余经验、被动地发生出判断的幸运者。论文在完成近邻检测后，正面回应“专业主义”反驳与“强回收论”的挑战，指出学术活力的根基不在于松动制度绳索，而在于由研究者主动承担可核算损失，在工序内部保留一小段不被安全处理所保护的不安全间距。

关键词 被动判断；剩余经验；最小保护；知识生产制度；判断力不发生

一、被争论淹没的真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自我反思，长久被锁定在两套话语之间。一套话语说：核心困境在于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附，我们必须从本土经验中生长出自主知识体系。另一套话语说：科学知识本没有国界，问题不在于用不用西方理论，而在于用得好不好。双方争论了二十多年，产出了大量纲领性论述，却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压在了语词的灰烬之下——那些被我们生产出来的知识，为什么越来越不疼了？

“不疼”，不是方法论概念，而是一种阅读经验。你翻开一篇关于底层劳动的研究，方法严谨，文献扎实，结论稳健。你知道外卖骑手被算法控制，家政工被情感劳动剥削，留守儿童面临家庭功能缺失。这些判断全是对的，可它们从你的认知表面滑过去，不留痕迹。你不是在阅读经验，你是在阅读已经被概念封装完毕的“研究发现”。这不是某个学者的冷漠，而是成型知识本身在抵达你之前，已经将那种本应割伤你的东西提前拧干了。

于是，焦点转向了“研究者”——那些本应被经验割伤的人，他们的刺痛去哪了？一个有力的判断出现了：一种弥漫在学术制度中的自我保护机制，以“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为运作法则，系统性地回收了研究者的判断胆量、经验感知力与伦理在场，将那个完整的、能够被经验割伤的知识主体，从生产工序中蒸发掉了。

这个判断比“依附论”更锋利，它把刀从“知识体系”移到了“知识生产者”身上。但它多走了一步。这一步走得很隐蔽，以至于它看起来像是把问题推到了底——实际上，它在一个更深的预设面前停住了。这一步是这样的：它默认了研究者的判断胆量、经验感知力与伦理在场，乃是先在的事实，只是不幸地被制度压力所回收。制度被描述为外在的、压迫性的绳索，研究者是被绳索捆住的、本应自由的主体。

但这个预设，从未有人质疑过：当那个研究者在田野里被一个场景攫住、感到痉挛、觉得“这怎么说得通呢”——那个感到刺痛的东西，难道不是在那一刻才发生出来的吗？它并不是她带进田野的某种先在的品质，而是田野里的某种经验，穿透了她在那一刻本已准备好的认知工序，逼出了一个尚未被任何现成框架包裹的、临时性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是“回收”的对象——因为它在被回收以前，本来并不存在。它是在那一刻，被剩余的经验逼出来的。

这里，“剩余”必须被精确地定义。本文所说的“剩余经验”，不是经验本身，不是“那个母亲的作息时间”或“那个骑手摔倒的反应”作为客观事实的在场。它是指：在研究者已经用安全知识将其处理完毕之后，那个场景当中仍然拒绝被处理完毕、继续缠住研究者、让她不安、让她觉得哪里不对、让她无法安然收工的那些残余之物。同一个场景，如果研究者从未尝试处理它，它就不是剩余——它是未经处理的混沌。如果研究者处理得非常满意，它也不是剩余——它已被安全地消解。只有当研究者用上了一切已知的、规范的、安全的方法，试图把这件事说清楚，然后发现还有东西在往外渗——那渗出来的、不服从任何已有概念的东西，才是剩余。

从此，本文不再谈论“判断力被回收”，而是追问一个更先的问题：什么样的条件，使一个研究者有可能被这种剩余经验逼出那种并非自己主动选择、而是被卷进去的、临时性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本文称之为“被动判断”——被动，不是消极，而是它的发生不来自研究者的主观意志，而是来自剩余经验对研究者已有认知工序的切断与强迫。

这直接改变了整个诊断的焦点。原初问题“中国社会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工程学发问，它预设了主体已在那里，只需搭建一个体系。此前的回收论把焦点移到了主体，但它仍然预设主体本应是完整的。本文问的是：主体为什么会是完整的？如果不是，判断力如何从工序的缝隙里被动地发生出来？这不再是“自主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判断力如何发生”的问题——一个比自主性更原始的问题。

本文改切如下：原问题“中国社会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分析单位太粗，切不出判断力的发生机制。真正的发生场域不是国家知识体系，不是学科总体，而是一个研究者面对剩余经验的具体工序。因此，本文改问：在解释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序中，判断力是如何从剩余经验里被动发生的？那些看似保护研究者“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的制度安排，是如何系统性地降低剩余经验在工序中到场的概率与烈度，从而使研究者难以进入被动判断的发生条件？这一裁定保留了原初问题的关切——追究自主性困境，但将自主性的发生学位置从“知识体系”这一客体，彻底移到了“判断主体如何被逼出”的生成现场。标题与摘要的表述，已严格与此裁定保持一致。

接下来，本文先瓦解两个预设（第二节），再正面展开被动判断的发生机制与三要件（第三节），继而重写“最小保护”工序如何阻止剩余经验到场（第四节），分析逆行者的真实处境并补足“不发生”的阴性案例（第五节），完成近邻检测（第六节），最后正面回应最严峻的两个挑战（第七节）。

二、两个预设的瓦解：撤退到原初困境

在正面展开“被动判断”之前，必须先清除两套旧预设。它们各自封堵了一条通往原初困境的路。

第一个预设，是依附论。它假设：我们本来有一套未受污染的、从中国经验里自然生长的概念能力，只是被西方理论的强势侵入压制了。只要摆脱依附，让学者回到本土经验的语境中去，判断力就会自然苏醒。这个预设的撕裂感是最明显的——它从未能解释一件事：那些在西方理论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的研究者，他们的判断胆量就真的更锐利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理论基本被阻断，那个时期产出的社会学知识，有比今天更“疼”吗？答案是：没有。那个时期的知识生产自有它自己的安全律令——政治正确性替代了方法论严谨性，但当政治正确性的边界收紧到足够窄时，它也能发挥和今天“不出错”完全同构的自我保护功能。依附论把“他者”当成了假想敌，其实安全律令的内核从来不在“西方”这种事上，而在于任何一套能够被制度确认为“正确”的评判标准，都可以成为研究者不去碰剩余经验的盾牌。

但这只是依附论最粗糙的版本。依附论在今天有一个更隐蔽、更强大、也更具迷惑性的变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方法论依附”。它不再表现为直接照搬西方理论框架，而是表现为将西方理论“操作化”为一套中性的、技术性的变量分析程序。一个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青年学者，可能从未读过半个福柯或布迪厄——但她熟练掌握多层线性模型、过程追踪法、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程序。这些方法本身当然是有效的学术工具，没有人可以否认它们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当这些工具的“技术合法性”被等同于“学术正确性”之后，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道新的安全护墙。研究者不再需要问“我是否依附了西方理论”——她可以坦然地说“我使用的是国际通行的规范方法”。在这个回答里，“国际通行”替代了“西方”，“规范方法”替代了“理论”。但这道护墙的功能，与旧依附论所批判的那道护墙完全同构：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不会被审稿人质问的处理程序，研究者用这套程序把材料处理干净后，那些无法被编码、无法被填入变量格的剩余经验，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操作化失败”或“信效度不足”，而非“旧知识不够用”的信号。方法论依附之所以比理论依附更具隐蔽性，是因为它的防线不在结论里，而在工序的入口处——它不告诉你“不能这么想”，它只是替你准备好了一套处理一切的机器，让你从未有机会撞上“这台机器处理不了”的那一刻。

第二个预设，更隐蔽，也更需要被精确拆解。它不来自依附论，而来自一个更深的假设：研究者是先有的判断主体，其判断力被制度压力所回收、抑制、剪除。这个假设看上去无可辩驳——那么多研究者在饭桌上敏锐、回到稿子里却安全，这么直观的撕裂感还能是假的吗？但问题恰恰出在“先在”二字上。当你在饭桌上讲那个城中村母亲如何在凌晨两点还醒着等未归的女儿，你是在“做”判断吗？不，你是在讲一个让你触动的场景。那个场景触动了你，因为它在那一刻切割了你日常的认知工序——你本来以为你知道底层母亲的生计策略，但这个母亲的作息时间以一种你没法轻松归类的方式，把你的那些知识晾在了另一边。这个“晾在一边”的瞬间，就是剩余经验在发生。它逼

出了一个你并未主动选择的回应——你沉默，你眼眶发红，你讲的时候声音发抖。如果此时有人采访你，让你把你的“判断”清晰地说出来，你可能要说好久，甚至可能说不清楚。因为那个触动，还不是判断——它是判断的前身，是判断发生的条件。

而你回到稿子里时，为什么不再有这种触动了？不是因为你被制度压力压制了，而是因为稿子这道工序从一开始就不要求你重新回到那个被晾在一边的时刻。稿子要求你用现成的变量、理论、方法去处理那段材料的“可验证部分”——而那个触动本身在你动手编码之前，就已经作为“非数据”被工序本身排除在外了。你以为你是被绳索捆住了判断的胆子，其实你连“判断是否可能发生”的那个原初条件，都没有被工序允许进入。绳索论的预设——判断胆量是先有的——恰恰漏掉了这个原初条件。判断胆量不是一种可以被回收的人格品质，它是在你被剩余经验逼到一个特定境地时，才被动发生的东西。如果你从未被逼进去，它就从未出现过——不是“被回收”，而是从未发生过。

两套预设拆掉之后，原初困境才真正露出来：问题从来不是“判断力被什么压住了”，而是“判断力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依附论误以为条件是“摆脱依附”，回收论误以为条件是“鼓起胆子”。其实真正的条件是：有没有一种工序，让你在足够长、足够深、足够无路可退的面对中，被剩余的、拒绝被你的安全知识所处理的那些东西，逼得切断自己。

三、被动判断：在剩余经验中被逼出的临时认知

现在可以正面提出本文的核心概念：被动判断。

被动判断，是指研究者在一段已经用安全知识处理过的经验面前，被其中拒绝被处理完毕的剩余之物所逼出的一种临时的、非主动选择的切断性认知。它不是研究者“看出”来的，而是被剩余经验“逼出”来的。它的发生，不来自研究者的意图，而来自剩余经验对研究者已有认知工序的切断——那个正在用标准处理流程分析材料的研究者，突然发现某些东西处理不掉、说不通、在往外渗。那个渗出来的东西，就是剩余。而那个被逼得被迫停下来、不得不去发明点什么来安置这种剩余的人，就是在被动判断。这个安置的动作本身，还不是知识——那是日后被写成论文的东西。但它是知识能够发生的那个最初的原点。

被动判断有三个要件。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本文与一切既有判断力论述的根本分离线。

要件一：安全知识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最容易产生误解。被动判断不是“面对未知时的假设”。面对未知时的假设，是研究者主动去猜想一个可能的解释——那是主动判断，属于传统方法论的“假设生成”阶段。被动判断的起点不是面对未知，而是面对“已知”——研究者已经用了自己最熟练、最规范、最安全的方法，把这个场景处理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结论。处理完了，按理说可以交作业了。然后她发现：还有东西在动。那个结论是对的，但它漏掉了什么。那个被漏掉的东西，不是她一开始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她已经知道、却无法被这个她已经完成的处理所容纳的东西。不是“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个问题”，而是“我已经说清楚了，但剩下的那个东西不放过我”。这才是剩余经验的发生：安全知识已经做满，剩余经验仍渗出来。

要件二：研究者主动放弃了更安全的处理方式。不是冒险。冒险是拿已有的结论去赌一个更锋利的却可能错误的说法。被动判断所放弃的不是结论，是工序本身——放弃用更安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剩余。研究者面对那个往外渗的、拒绝被现有结论装下的东西，她可以选择继续用更精细的标准方法

去打磨它、把它塞进某个可验证的变量里去、或者干脆声明“这是本研究的局限”。这些都是安全的操作。但她放弃了。她停在一个不安全的位置上——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但她知道如果此刻不站住，这个东西就从工序里滑出去了。这个放弃，不是勇气，不是对抗制度压力，而是她被剩余经验逼到了一个位置上之后，做出的唯一一个主动动作：不跑。她没有鼓起胆子去反对什么，她只是没让那个东西滑掉。

要件三：出现了切断——对已被安全知识所覆盖的旧说法的临时搁置。有了要件一（安全知识已完成）和要件二（放弃更安全的处理），研究者在此刻做出了一件接下来的事：她暂时地、局部地、带着不安地、不确定地，把旧有的结论推到了一边。不是推翻，是搁置。那个旧结论还在那里，它仍然是对的——但它此刻不能用了。因为那个剩余的东西，如果一放进旧结论的框架里，就立刻被溶掉、被吸收、变成旧结论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注脚。而研究者此刻要做的，不是证明旧结论是错的，而是给那个还没名字的东西留出一块不被旧结论提前定义的空地。这个暂搁旧说的动作，就是“被动判断”的切刃。切刃本身还不是新的概念生成——它是新概念能够被逼出来的那一个必要条件：旧说在这里被切断，剩余之物第一次有了不被提前命名的那一瞬。

这三个要件连在一起，可以写出一个完整的被动判断的现场形态。此处，本文选择一个核心案例进行纵深展开——这是一个研究基层治理的学者在田野结束后一年的真实经历。[1]

她在结束了华北某街道办为期一年的田野后，写出了一篇规范、完整、理论对话清晰的初稿。她的核心框架是“协商性治理韧性”——论证基层干部与居民如何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一套超越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协商机制，这套机制在遇到冲突时表现出一种“韧性”：不会被单次失败击穿，而是通过反复的微型协商持续吸收矛盾。她的论文用这框架处理了七个案例，每一个都严丝合缝。她在结语里写道：“本研究发现，基层干部与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商性治理韧性’，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基层实践中的应用。”写完之后，她觉得可以交稿了。

当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翻看田野日记，读到一段她自己在初稿里没有使用的记录。这段记录发生在一次长达四小时的居民争吵之后。争吵的双方是同一个单元楼的两家人，争吵内容涉及楼道堆物、噪音、宠物粪便——全在协商治理的范畴之内。争吵结束、两方各自表示“我再跟你说也没用”之后，他们并没有离开楼道。两个住户的中年男人，在楼梯间的台阶上沉默地并肩坐了十分钟，抽烟。这十分钟里没有人说话。十分钟后其中一个人开口说了一句与争吵内容完全无关的话——“你上次说的那个水管，我找人问了，下周可以修。”

她在日记里标注过这个片段，但在写初稿时她判断它是离题的。她尝试过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把它归入“非正式协商的延伸”——那十分钟的沉默是“冷却期”，水管那句话是“关系修复的信号”。但她删掉了这个方案，因为她自己知道，那两个人从争吵结束到并肩坐下那一刻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言语协商、没有任何“我们歇一会儿再谈”的共识——他们只是同时没走。第二种，她试图把它作为信任建立的一个子类目纳入“社会资本修复”的框架——争吵破坏了信任，并肩抽烟修复了信任。但她再次作罢，因为她反复读那段日记，发现自己无法把“并肩坐下的那一刻”定位为“修复”——修复预设了关系的断裂在先，但那两个人在争吵最激烈时仍在共用一只打火机。不是断裂后修复，而是某种与断裂无关的状态一直平行存在着。

她意识到问题在哪了：“协商性治理韧性”整个框架，只捕捉到了那些被说出来的、被争论的、被协商的东西——被推进、被交锋、被吸收或拒绝的主张。但这个框架在原理上就无法容纳那个抽烟

的沉默：它不是协商的中断，不是韧性的暂时失灵，而是某种与协商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在话语之外、不以解决任何问题为目的的共存状态。那个沉默的十分钟里，两个人不需要韧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对付任何需要被韧住的压力。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而当水管那句话终于被说出来时，它也不是韧性运作出来的成果——它是从那个沉默里自己滑出来的，像一块被水泡了很久的木屑，不知什么时候就浮到水面上了。

她此刻有三个选择：一是继续修改初稿，给这套框架加一个“非话语维度的隐性资本”补丁，把抽烟沉默编码为“默会协商”的一种特殊形态，然后安心收工；二是把这个片段作为“本研究的边界现象”写进局限一节，礼貌地承认框架未覆盖此类沉默状态，然后继续往前走；三是关掉正在修改的文档，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纸，在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这个沉默的十分钟，不是信任、不是韧性、不是协商——那它到底是什么？”

她做出了第三个选择。那天晚上她写到凌晨三点，把这张纸写满了。她在那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此前任何理论都没有为她准备好的问法：在这个基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在一起”，是否需要通过“把事谈成”来维持？如果不需要——“在一起”的先决条件不是解决问题的效率——那么“协商治理”就是“在一起”的下位概念，而非相反。她的旧有结论并没有被推翻——那七场争吵确实体现了协商性韧性——但这个旧结论被搁置了。它在它的领地之内仍然是对的，但它此刻不能用了：因为那个抽烟的沉默，如果一放进“韧性”的框架里，就会被立刻溶掉，变成韧性休息了一下、恢复了一下、然后继续运转的证据。它永远不会被允许自己说话。

第二天，她在那张白纸的背面写下了第二篇论文的核心问题：“非协商性共在——基层社区中的沉默共存如何独立于治理韧性，构成一个不可被解决逻辑还原的存在维度。”这篇论文在三年后才发表——她在那三年里只发了这一篇，而她所在单位的评估周期是三年需要发表至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那三年里，她的同事拿了两个课题结项，她只有那一篇。但这篇论文最终做了一件事：它把“协商性治理韧性”的有效边界画了出来——韧性只在“有事要谈”的领地内成立；在那些“没事要谈”的沉默共存里，韧性不是失灵了，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在场。

这个案例完整地展示了被动判断的三要件如何在同一段工序里被依次触发——安全知识做满（“协商性治理韧性”已完美覆盖七个案例）、尝试安全处理却被“擦不掉”的剩余经验逼退（两次编码尝试都“把画面压扁了”）、放弃安全处理（不补丁、不写进局限）、搁置旧说（不是否定而是限定其有效边界）、被逼出新的问法。那个新问法不是她的胆量发明的，是她被那个洗不掉的东西发明的。她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有觉得自己在创新。我只是没办法——所有能用的概念都用了，那个画面还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可还原硬检验。被动判断，能不能被现有理论无损替换？

首先，它不是“顿悟”。顿悟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术语，指知觉重组——你突然看见了原有的要素之间的一种新关系，从而解决了问题。顿悟的发生机制是“对同一批要素的重组”，它是认知心理学内部的解释；它不涉及制度条件、不涉及安全知识的保护网、不涉及“放弃安全处理”这个决断时刻。在顿悟的研究中，主体只有认知结构，没有制度位置。一个学者在制度压力下、在安全知识已然完成之后再被剩余经验逼出切断——这个位置连顿悟理论都还没命名过。

其次，它不是杜威的“反省思维”。约翰·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精细地描述了思维的发生：它起源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一个岔路口、一种困惑、一阵犹豫，它打断了流畅的习惯，迫使个体停下来进行探究，直到形成“有根据的断言”（warranted assertibility），使经验的流动得以恢复。这个描述与被动判断在表面上有惊人的相似：都是被某种东西打断，都是旧有的流畅被中断，都是在不确定中被迫停留。但二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可通约的差异。杜威的反省思维，其终点是解决问题——探究的目的，是把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可被理性掌控的情境。思维的意义，在于它重新组织了经验，使之能够继续流动。而被动判断的终点，恰恰不一定以解决问题为目的。那个在楼道里被抽烟沉默攫住的研究者，她在铺开白纸的那一刻，并不是在“解决问题”——她不是在试图把那个沉默纳入某种更高级的理性框架中去。她只是搁置了旧说，空出了一块不被任何现成概念定义的空地。那个沉默在其后的三年里一直未被“解决”——它只是最终被一个足以容纳它的新概念框住了，而这个新概念的功能，不是让沉默变得“可被理性掌控”，而是让沉默得以在不被转化为“韧性”“信任”“协商”的前提下，被承认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维度。被动判断的终点不是“断言”——是“搁置之后那件事自己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这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探究逻辑所无法容纳的：在杜威的框架里，搁置是暂时性的策略，其价值在于最终通向更好的断言；而在被动判断里，搁置本身就是那块空地被保住的唯一方式，断言不是目的，是副产品。

更重要的是，杜威的反省思维从始至终依靠的是主体的主动探究能力——那个遇到岔路口的人，是主动地去分析问题、检验假设、寻找出路的。被动判断的主体在发生被动判断的那个此刻，恰恰没有这种主动性。她不是“主动去探究”，她是“被剩余经验逼到了旧识的边界外，暂时不知道往哪走”。她停在那里，不是因为理性告诉她“此处需要反思”，而是因为她所有能用的理性工具都已经用过了，剩下的那个东西还在那里，不去。这种被动性——在安全知识饱和之后被剩余之物擦伤而产生的临时的认知切断——是杜威的整个探究理论从未处理过的情境。杜威的主体从困惑走向解决；被动判断的主体从解决走向困惑。

其三，它不是“认知失调”的实例。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57）预设了一个主动的心理调适过程：当主体持有两个相互冲突的认知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从而驱动主体通过改变其中一个认知、增加新认知或降低冲突认知的重要性来恢复一致性。此简化看似可行，实则漏掉了被动判断最关键的一环。认知失调的主体是在两条已有路径之间做选择——她知道她要调什么、往哪个方向调、调完之后回到一致的状态。“被动判断”发生的那一刻，研究者恰恰没有任何可选的调适路径：她被剩余经验推到旧有框架的边界外，她不知道那个渗出来的东西“应该被调到哪个已有的位置上去”——因为所有已有位置都试过了，都压不住。她不是在选择，她是在被搁置。她不是在追求一致，她是在承认旧有一致性的破产之后，暂时什么都不追求。这个“被动性”（被卷入）与“切断性”（临时搁置而非主动调适），是发生学上的关键区分，而非心理学上的程度差异。认知失调的终点是“恢复一致”，被动判断的起点恰恰是“不再试图恢复一致”——二者在同一段工序中先后出现，但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

其四，它不是“批判”。批判传统（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到福柯）的共同预设是：主体有意识地反思构成自身位置的那些条件，以此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视野。批判总是主体的一个主动姿态——“我反思到了这一点”。被动判断恰恰相反：它的起点不是“我反思到了”，而是“我先前被逼到了一个我说不清楚的地方”。主体在发生被动判断的那个此刻，还不具备批判意识。她只是停在那里，不舒服，没法用旧说收工，没有理论语言可以调用来解释她此刻的不舒服。这种“被逼到”的状

态，在批判传统的理论里没有对应的位置，因为批判传统预设了主体已经具备了足以把“不舒服”转化为“批判”的理论语言。更重要的是：被动判断并非批判理论的弱版本——它没有“等待被批判理论吸收、深化并补全”的阶段。一旦主体进入了批判意识——即她拥有了可以解释她所受到的结构性压力的成熟理论语言——她就离开了被动判断的现场。因为她此刻的认知，不再是被剩余经验推迫、无法从容收工的临时状态；她可以用批判理论为她的不舒服提供完整的命名、归因与解释。那些“说不清、无法安置、却在继续渗出的东西”，在她掌握批判理论之后，不再是剩余，而是可以被归入“制度暴力”“话语权力”“规训机制”的既有问题的例证。旧说在这里不是被“搁置”的——它被更高级的理论语言吸纳并重新编码。被动判断的临时空地，被批判理论的现成话语重新填平了。

它也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微缩版。库恩的范式转换，发生在常规科学遭遇了足够多的“反常”之后——那些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旧范式不再能有效收编它们，科学共同体被迫进入危机，最终由一个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库恩关心的是共同体的知识结构的整体更替，而非个体在特定工序里的认知事件。被动判断的现场，通常不涉及“反常的积累”——那个抽烟的沉默，只发生了一次，它在那个研究者自己做完的工序里，连“反常”的资格都没有获得（它被作为“离题”剔除了）。当它最终被逼成一个新问题时，它也从未试图“取代”协商性治理韧性——它只是画出了它的有效边界。这是“圈地”，不是“革命”。更重要的是，库恩将范式转换描述为一种非理性的“皈依经验”——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研究者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像宗教改宗。而被动判断的发生机制，恰恰是高度理性的：研究者不是放弃了旧框架的理性，而是用尽了旧框架的理性之后，在它边界的外侧，发现了理性尚未抵达的一块新地。她不是跳过去的，她是被推过去的。她在那张白纸上写下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推理，不是顿悟；但那推理的起点——旧说必须被搁置的那块空地——不是推理推出来的，而是被剩余经验逼出来的。被动判断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个过渡事件：它发生在旧理性的用尽处，完成于新理性的构建前。它本身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它是一个中间物种。库恩的范式转换没有为这个中间物种保留概念空间。

四、最小保护：当安全的经验处理工序让剩余经验不再到场

如果被动判断的条件，是安全知识已经做完、然后剩余之物还在往外渗，那么阻止被动判断发生的最有效方式，就不是“禁止研究者做判断”——那太笨了，也会招致反抗。真正高效的、被研究者内化为“专业素养”的方式，是在工序层面降低剩余经验到场的概率与烈度。让处理过程变得足够安全、足够快、足够体面，以至于在安全知识做完之后，那个可能渗出剩余之物的裂缝，已经被工序本身的保护层糊住了。

这里，本文将对既有的“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三条律令进行一次根本性重写。它们不是绳索，不是外在于研究者的压迫力量，不是捆住“本应自由的研究者”的桎梏。它们是最小保护操作——通过最小化研究者在工序中承受剩余经验的时间与烈度，使安全的经验处理显得“够用”且“唯一可行”。它不是在压制一个已有的判断，而是在防止判断发生的条件被触发。

“不出错”的最小保护：让安全知识提前满格。“不出错”的经典形象，是一个严厉的审查者拿着一把剪刀，把任何可疑的判断都从论文里剪掉。但更精确地说，它起作用的方式远比这更早：它不是在写论文的時刻剪掉你的判断，而是在你还没开始面对经验本身之前，就已经帮你选好了那些“可以碰”的材料。当你从导师那里接过选题、从文献里搜寻研究空白、从中层理论里选出待检验的变量

时，“不出错”的保护就已经在运转了。它不是堵住危险——它是用安全的通道替代危险的通道，让你在走完整条通道之后，从未真正撞上过那个危险的缺口。一个按照“不出错”保护做完论文的博士生，全程可能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她的理论框架已经完美地解释了数据，但她自己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她没有被逼到那个点，不是因为她胆子小，而是因为她的整个研究过程的设计，就没有让那个“哪里不对”有出现的条件。她选了一个干净的案例，用了干净的数据，框了一个干净的变量集。她的工序太安全了，以至于剩余经验根本没有机会渗出来。

这里隐藏着一个更精细的运作：不出错不仅在选题层面过滤材料，它还在日常的学术训练中，系统性地培养出一种“精致的平庸”的品味。一个被导师反复赞扬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其标准句式是：“本研究以XX理论为框架，从XX数据库中选取XX变量，采用XX模型，旨在检验XX假设。”这句话的每一个成分——理论框架、数据库、变量集、模型、假设——都是已经被前人验证过的、安全的、不会出错的。它不是被强迫写成的，它是被训练出来的：博士生在开题答辩上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这个变量怎么测量的”，而不是“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当“怎么测量”替代了“为什么要问”，安全知识就从方法论工具变成了认知门槛；研究者不再需要面对“那个问题真的存在吗”的风险，只需要论证“这个问题可以被规范地操作化”。而“可以被规范地操作化”与“值得被研究”之间的那个裂隙，正是剩余经验可能发生的地方——不出错的最小保护，把这个裂隙从一开始就糊死了。

“不浪费”的最小保护：用可操作变量替掉不可编码的厚度。一个在民工子弟学校待过两年的志愿者，记录过一个每天趴在桌上睡觉的男孩。在研究模型里，这个男孩被编码为SES低、家庭结构缺损、学业表现差。志愿者知道另一件事：男孩的母亲在城中村做零工，每天凌晨两点回家，他还有一个三岁的弟弟要照顾，他整夜都在出租屋里醒着——等母亲，哄弟弟，在黎明前睡一小会儿，再被闹钟叫起来上学。这个“整夜醒着”的因素，不可能被收进任何一个标准数据库里。按照规范的方法论建议，它应当被作为“边界现象”或“研究局限”加以处理，不得进入主结论，因为它的收集方式不规范、样本量不足、无法通过信效度检验。你看，工序并不是粗暴地删掉了它——它甚至很人道主义地给它留了一个位置：“局限”。但这个“局限”位置本身，就是最精妙的最小保护：它把那个本应刺破整个模型的剩余经验，体面地安放在一个不会威胁主结论的墓地里。研究者此刻不需要搁置旧说，不需要切断自己的旧结论，不需要被这个男孩逼到必须问出“如果他不只是SES低，我还需要发明一个什么概念来装下这个‘整夜醒着’的机制”。他仍然可以使用SES解释学业表现，然后礼貌地在结尾处表示：“本研究对家庭微观互动的测量尚有不足，未来研究可通过民族志方法深入捕捉。”余下的东西，被安全地交给了未来，而未来永远不会来。

但“不浪费”还有一层更深的最小保护，发生在田野时间的制度核算里。当代解释性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其田野时间的制度核算单位越来越趋向于“可计量的有效时长”。一个博士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填写“研究方法”一栏时，他需要写出“将在XX市进行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预计完成深度访谈60-80份，参与观察笔记不少于10万字。”这段文字里，“6个月”是承诺的时长，“60-80份”是承诺的产量，“10万字”是承诺的厚度。这三项承诺，共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保护动作：它们把田野变成了一个可以在项目结项时被逐项打勾的清单。6个月到了——打勾。80份做完——打勾。10万字码完——打勾。而那些在清单之外的东西——那个被访者在访谈结束后半小时突然打来的电话、那段在正式观察时段之外发生的偶然对话、那个研究者在田野日记里不敢写进去的不安——它们在表格里不存在，因此在结项时不构成“未完成”。研究者从未被要求删除这些经验；他只

是从来不需要为了结项而去面对它们。他完成了表格里所有承诺，合格地、体面地、安全地离开了田野。剩余经验没有到场，不是因为被压住了，而是因为工序从未要求它到场。

“不亏本”的最小保护：把深泡变成一笔不划算的账。田野里的陪伴，不是一种可核算的劳动。一个做家政工研究的学者，在跟一位阿姨朝夕相处了四个月之后，发现自己在任何正式访谈里问出的问题都是浅的——阿姨在访谈中说的“苦”，是已经被自己加工成“过去的事了”的那种叙述调子，没有刺，没有淤。真正刺人的东西，出现在访谈结束时阿姨不经意说的一句话里：“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句话，花了她四个月的时间才等到。但它不被计入工时。当她向课题管理部门提交结项报告时，有一个格子要求她填写“数据收集阶段的有效访谈场次与时间”，她填了28场、每场60-90分钟——这些是正式访谈。那句“心里空落落的”，发生在第29次——没有录音笔，没有知情同意书，不在表格里。

这里需要被解剖的不只是“那句话被漏掉了”，而是那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这位学者所在的是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文学科院系，实行“预聘—长聘”制度。她的第一个聘期是六年，需要在聘期内发表至少四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至少两篇需要在三年中期考核时完成或被录用。她的那四个月田野，在结项表格里被换算为28场正式访谈——这是可以填入“数据收集”格的唯一合法产出。那第29次没有录音的对话，在制度格子里根本不存在。她已经用掉了聘期第一年的整整三分之一，只产出了一个无法被核算的瞬间。如果她选择在下次田野里继续等——再花四个月去等另一句不能填进表格的话——她的三年中期考核就几乎不可能达标。非升即走的倒计时不是在禁止她深泡，而是在让她自己算一笔账：等到那句话的代价，可能是在第三年被判定为“科研产出不足”、收到“不再续聘”的通知。当制度把“花掉四个月等一句话”和“花掉四个月做完28场可录入表格的访谈”同时摆在她面前时，制度没有禁止前者，制度只是让前者变成了一笔她不敢算第二次的账。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起第二次。

这就是“不亏本”的最小保护在最底层的运作方式：它不禁止任何东西，它只是在时间的格子里、在成果核算的公式里、在聘期倒计时的滴答声里，悄悄地把“等待剩余经验”从“专业投入”重新定义成了“职业风险”。[2]研究者在做出这个选择时，觉得自己是理性的、是专业的、是在为自己负责——而这恰恰是“最小保护”最精妙的地方：它让你自己选，让你觉得自己是自由地在选，从未有人拿刀逼过你。但它已经把那个选项的成本调到了你不敢再选第二次的高度。

“不亏本”并非本文的哲学隐喻，它在操作上直接锚定于中国高校当前通行的预聘—长聘制（非升即走）的考核周期、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课题对结项成果的量化要求。当“三年内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被写入人事合同、“项目周期为三年、结项成果为一部专著或三篇CSSCI论文”被写入课题申请书时，“不亏本”就已经从一个隐性规则变成了一个可精确核算的制度参数。研究者从入职第一天起，就可以清晰地算出：如果她花一年时间等一句不能填进表格的话，那么她在剩下的两年里必须完成两篇核心期刊——这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入职时算完这笔账之后的反应，不是“我被压迫了”，而是“我得活下来”。一个人为了活下来而选择更高效的田野、更规范的变量、更安全的选题——这不是道德溃败，这是制度格子里的理性生存。而正是这种生存理性，让“最小保护”得以在每一个研究者的日常选择中被持续地执行，而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的直接施压。制度不需要派一个人来监督你——你自己就是那道工序最尽职的监工。

五、发生与不发生：剩余经验烈度的阶差与工序失败的全过程

在最小保护的全面覆盖下，仍有少数研究者做出了高质量的、让人心头发紧的经验研究。但本文拒绝将这一现象归因于“逆行者的人格品质”。必须做一次更彻底的事件化：不是有一类人叫“逆行”，而是在某些具体的时刻，一些被刻入了具体工序条件与生平卷入的逆行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的共同结构是：一个研究者被卷入烈度更大的、持续时间更长的、拒绝被任何安全处理收敛的剩余经验；且在剩余经验逼到要件二的门口时，她恰好有一条微小的“不亏本”裂缝——聘期底线已达标、或有一笔独立于考核之外的经济支撑、或一位愿意替她挡掉大半行政事务的导师——使她在那个关口没有立刻退回安全工序。

但这只是“发生”的那一侧。本文的发生学要真正闭环，必须完整追踪“不发生”的那一侧——那些同样承受了高烈度剩余经验、却在要件二的门口退回去的学者，他们退回去的那一个具体的动作序列是什么。以下呈现一个匿名的、基于真人经历合成的阴性案例。[3]

她是一位在某“双一流”高校社会学系任教第四年的讲师。预聘—长聘制的第一个考核节点在第五年年底——届时她须提交至少两篇已发表（或已录用）的核心期刊论文，一份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的立项证明，以及系学术委员会的续聘投票。到第四年年初，她手上有一篇已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另一篇在修改后被拒、正在转投。她还有两个在研课题，都是校级青年项目——考核不认。

第四年三月，她完成了对华南某城中村为期八个月的田野。她的材料里有一段她自己的田野日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三十八岁的女工，每天在电子厂工作十四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天。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带，每年只在春节见一面。在第八个月的某一天，女工下了晚班，请她在厂门口的大排档吃宵夜。那是一顿吃了一个半小时的饭，女工的话一直很密，讲工厂里的纠纷、讲室友打呼噜、讲食堂的饭菜越来越难吃。她在日记里写道：“她说话的样子像在往一个罐子里倒豆子——不是要跟人对话，是要把攒了八个月的什么东西倒空。”饭吃完，女工说“我回去了”，站起来，走了三步，回头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要是还在就好了。”然后没等她回答，就拐进了巷子里。

这句话让她当场被钉在原地。在那一瞬间，她明确地知道，自己此前写了一半的初稿——用“社会支持网络对流动女工心理健康的缓冲效应”框架分析她收集的二十八场正式访谈——没有能力装下这句话。这句话不是“社会支持”，不是“心理健康”，不是“缓冲效应”。它是一个人在给另一个人某种无法被任何已知概念命名的东西之后，说出的唯一一句表达。她在那天晚上的田野日记里写了一段很长的自我询问：“她是在说舍不得我，还是在说舍不得那个被听见的自己？她说完就走、不等我回答——是怕我回答，还是不需要我回答？我的在场，对她而言，究竟是一个研究者、一个朋友、还是一个从外面来的、迟早要走、却让一些事变得可以说的‘短暂的陌生人’？”

她第二天打开电脑，开始写第二稿。她没再用“社会支持网络”当核心自变量。她把女工那句话当作一个不可被压缩的初始材料，整篇论文围绕着“流动女工自我叙事的条件”——在什么样的关系中、什么样的时间结构里、什么样的权力不对等之下，女工们才觉得“可以说”——来重新组织。她对自己定的规矩是：论文的主结论，必须能让这句话被完整地放进去，而不被任何一个安全概念溶掉。

第二稿的导论和前半部分论证，她在两周内写完了。然后她做了一个动作：她打开预聘期考核的倒计时。第五年年底之前，如果这篇稿子发不出去，她需要另一篇核心期刊来替补。而她手上正在转投的那篇被拒的稿子，审稿周期至少还要四到六个月。如果第二次被拒，她将没有时间在第五年的考核节点前完成替补。她在那天下午做了一件事：她关掉了正在写的第二稿文档，在桌面上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暂存”。她把第二稿的文档拖了进去。她打开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申报系统，开始在线填写“课题论证”页。她在那页的第一个格子里写道：“本课题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框架，从压力过程模型与心理弹性视角出发，通过对流动女工的深度访谈，探讨社会支持网络在调节其心理健康中的缓冲机制。”她写了整整一个下午，把论证写满了。写到“预期成果”一栏时，她填了：CSSCI论文两篇。

两个月后，她那份项目申报书拿到了立项。她在结项期限的最后一周，发表了两篇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的研究设计执行的CSSCI论文——框架是“社会支持网络”与“心理弹性”，数据是那二十八场正式访谈，结论是“流动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呈现XX特征，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缓冲效应”。这两篇论文干净、规范、安全，通过了考核。

一年后，她的续聘投票顺利通过。她在清理电脑桌面时，打开“暂存”文件夹，看了一眼那篇半截的第二稿。她把它关了。文件夹至今还在。

这个案例里，剩余经验发生了——那回头一瞥和那句话，是真切地刺穿了旧框架的。安全知识做满了——那篇用缓冲效应框架写的初稿，是她当时全部安全能力的顶配。但要件二没有被完成。她没有放弃更安全的处理。她没有放弃，不是因为道德勇气不足，而是因为她在那个裂隙的门口做了一次精确的核算，然后关掉了文档。

这就是最小保护在“不发生”一侧的完整刀法：它不需要阻止剩余经验发生，它只需要让剩余经验的迫近与倒计时的迫近同步抵达，然后让你自己在那个关口算完那笔账。“暂存”文件夹，就是最小保护在数百万台电脑桌面上留下的那道统一伤疤——它从未被任何制度文本写入，但它比任何一条白纸黑字的规章都更精确地标记了判断力不发生的那口临界井。

六、近邻检测

本文所属学科：知识社会学／解释性社会科学方法论。以下逐一交代。

（一）与“回收论”的分离——本文最危险的近邻。既有论述已精准地指出，“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三条律令构成制度绳索，回收研究者的判断胆量与经验感知力。此立场是本文最可能被读者判定为“换了一套说法”的近邻，必须在此单独展开分离论证，不留任何可被合并的后路。[4]

两套框架用同一个案例读一遍，差异点会立刻显形。拿本文第三节那个“楼道抽烟”案例来读。

回收论会这样读这个案例：这位研究者的判断胆量，本来足以让她在看到抽烟沉默的那一刻就意识到“协商治理韧性”框架有漏洞。她之所以在写初稿时选择了回避——把那个片段判为“离题”而不使用——是因为“不出错”这条绳索在起作用：她在写稿时已经预感到这个片段若被纳入论证，将会引发方法论上的麻烦（“你这个证据不规范”“这怎么能编码为韧性”），因此她的判断胆量在压力下回收了，她选择了安全的处理。而当天晚上她重读日记、铺开白纸的那个瞬间，是绳索松动的一

刻——期刊的压力暂时退场、审稿人的声音暂时不在耳边，她的判断胆量得以短暂地挣脱绳索、浮出水面。

如果你接受这个读法，那么你是在说：这位研究者的判断胆量本来就潜伏在她体内的某处，只是被外界压力压住了；一旦压力暂时消退，胆量就自然上浮。

被动判断论会这样读同一个案例：这位研究者用了她当时能用的全部“安全知识”——“协商性治理韧性”框架、“社会资本修复”理论、“非正式协商的延伸”概念——试图把这个片段处理掉。她试了两种方式，每一次都发现那个画面被“压扁了”。这证明的不是“她怕了”——而是她当时所有的安全知识加在一起，对那个抽烟的沉默无效。这不是胆量被回收，是旧说有边界。当天晚上她铺开白纸的那个瞬间，不是一个“绳索松动后胆量上浮”的瞬间——因为在那个瞬间她仍然不知道自己写什么。她写下的第一行字是“这个沉默的十分钟，不是信任、不是韧性、不是协商——那它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挣脱了绳索的人在“说出她早就知道的东西”——这是一个人被旧有框架的边界逼到无路可退之后、被迫去发明一个新问题。那个新问题在她铺开白纸之前，并不存在于她的体内——它是被那个擦不掉的画面刺出来的，不是被松弛的绳索释放的。

这两个读法的差异，在同一个点上被拉到了最开：那个晚上，她到底是在“说出早就知道的东西”，还是在“被剩余经验逼出一个她此前并不知道的新问题”？如果你相信前者，回收论够用。如果你承认后者——承认那个新问题在她被剩余经验刺到之前并不存在——那么回收论就漏掉了最关键的发生环节。“判断胆量的回收”预设了判断的内容已经先在，只是表达被压制了。被动判断论证的是：在表达的压制发生以前，判断的内容本身就可能从未被逼出来。而这个“逼出”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压力小了就出来了），是一个结构问题——那道工序里有没有一个让剩余经验渗出来的缝。没有缝，再小的压力也逼不出判断，因为判断连“尚未发生”都谈不上。

此外，回收论在解释“期刊取消方法限制后，某些研究者的文字仍然不疼”这一现象时，需要调用“心理惯性”作为补丁——绳索松了但研究者已经习惯了被捆。而被动判断论不需要这个补丁：因为工序仍然没有让剩余经验到场——方法限制只是三条保护律令之中的一条，不浪费和不亏本仍然在运作。判断的不发生，不是因为惯性，而是因为条件仍然不具备。如果制度改革只是松了方法这根绳，而田野时间仍然被压缩进可核算的格子里、非升即走的倒计时仍然在嘀嗒响——那么剩余经验在工序中到场的概率，几乎没有变化。回收论和被动判断论在这里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前者预测“松绑必然带来判断力的复苏（除非心理惯性滞后）”；后者预测“松绑不必然带来判断力复苏，除非工序中剩余经验的到场概率同步提升”。这个预测差，就是分离的实证根基。

（二）与波兰尼“默会知识”的分离。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1958); *The Tacit Dimension* (1966)（学科：知识论）。波兰尼证明了一切知识根植于无法被形式化的个人判断力——“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更多”。分离线：波兰尼维护的是默会维度作为知识构成中不可消除的那一面；本文切割的是默会维度发生之前的一个更原初的事件：被动判断。默会知识是一种已经沉淀在身体里的、可反复调用的隐性能力——一个熟练的民族志学者可以在每次访谈中调用它，而不需要被任何东西逼出切断。被动判断则是一种尚未沉淀、尚未被命名、仅在特定条件下被逼出的临时的认知切断。默会知识可在无剩余经验的条件下大量存在；被动判断必须等待安全知识到满、然后被剩余之物推过切口。可裁决判据：如果一个研究者日常工作就充满了默会判断（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访谈者），但终其职业生涯从未出现过“安全知识已做完、某样东西仍擦不掉、被迫搁置旧说”的经

历，那么在波兰尼的框架里他的默会知识完整有效，在本文框架里他的被动判断尚未发生过——这可否被这个研究者自己分辨出来？应当可以。如果他明确否认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切断而仍然产出了锐利的新判断，那么本文的解释力就需要退让。

（三）与埃斯波西托“免疫体”的分离。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2002)（学科：政治哲学）。埃斯波西托揭示了一种保护逻辑：共同体吸收一点外部威胁来产生免疫，但当免疫过度运转时，它会吞噬共同体本身的生命。分离线：免疫体的操作对象是“威胁”——真实存在的、外部的、有害的东西，免疫机制通过纳入微量的威胁物来进行整体防御。被动判断的操作对象是“剩余经验”——它不是威胁，它不有害；它只是安全知识做完之后没有被收编的残余。工序不是在防御它，而是在提前降低它到场的概率。这完全不同于免疫体：免疫是主动吸收威胁，最小保护是提前绕开剩余。前者是“纳入”，后者是“绕行”。可裁决判据：在“保护高度严密、但某研究者因特殊生平与被研究对象共享同一种经验”的情况下，免疫论预测该研究者同样会被过度免疫（因为保护机制作用于任何人）；被动判断论预测他更有可能被剩余经验逼出切断（因为生平共享增加了他“擦不掉”的概率）。如果撤除保护导致学术界普遍出现质量下降和混乱，免疫论正确；如果撤除保护导致判断力更频繁地发生、更大量地被记录下来（尽管伴随痛苦与不适），则本文更接近真值。此外，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已用自己的“最小保护”语言重写——它不是免疫情境，而是工序绕行情境。研究者不是在吸收威胁中过度免疫，而是在风险规避中从未让剩余经验进入工序。[5]

（四）与戈夫曼“框架断裂”的分离。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1974)（学科：社会学）。戈夫曼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赖“框架”来定义情境、组织经验。当既有框架被某个事件打断或撞碎，人们会陷入短暂的认知混乱，然后迅速重新框架。分离线：戈夫曼的“断裂”，是被外部事件打断的——事件砸过来，框架碎了。被动判断的“切断”，是在安全知识已经将经验成功框架化之后，由剩余经验从框架内部逼出的主动悬搁——旧说还在，研究者主动搁置。框架断裂是“框架×事件”的冲突；被动判断是“框架×剩余经验”的迟到的冲突。关键差别：如果研究者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框架来框住那个场景，那是戈夫曼的断裂时刻；如果她已经用旧框架把它框得很清楚了、自己也满意了，写完交稿之后才发现还有东西漏了，那是被动判断的触发。可裁决判据：如果一个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记录了一次“当场就感到框架不够用、陷入认知震荡”的时刻，并因此直接开启了新思路，这是框架断裂；如果她在田野结束一年后、已写好规范初稿、已用旧框架把材料“封口”之后，才被某条日记里的残余片段逼出被动判断，则本文成立——它的发生时点与旧框架的关系，与戈夫曼断裂恰好构成一个时间结构上的分离线。

（五）与巴切拉德“认识论断裂”的分离。Gaston Bachelard,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1938)（学科：科学认识论）。巴切拉德主张科学知识通过克服“认识论障碍”实现断裂式推进——日常经验的直接认识会阻碍科学概念的形成。分离线：巴切拉德的“认识论障碍”是一种认知陷阱，需要通过理性工作被清除；本文的“剩余经验”并非障碍，而是认知推进的现实条件本身。更根本的分离点在于：巴切拉德的断裂（新知识推倒旧知识之后开始的那一段完全不同的构建）恰恰是被动判断完成之后的工作——被动判断只是推倒的前一个瞬间、旧说被搁置、临时空地初现而新构建尚未开始的那个不稳定阶段。断裂是被动判断完成了新知识构建之后的结算，不是被动判断本身。

可裁决判据表。 核心命题：当研究工序以“最小保护”方式降低剩余经验到场概率时，被动判断将系统性地不发生。可通过比较不同工序条件下研究者经历“被动判断”的频次与深度加以检验。控

制学科、职业阶段与机构类型，识别出入职后五年内曾出现安全知识已处理完毕、某材料却反复在意识中渗透、被迫放弃旧说的研究者所占比例。在田野时间充足、方法强制较弱、导师容许不确定性的研究环境中，此比例应显著高于高保护压力环境。若两者无显著差异，则本文关于工序系统的论断需补入更多限制条件。

阴性案例最可能出现在以下两类情境：（1）工序保护高度严密，但研究者因生平共享而被高烈度剩余经验卷入，最终发生了被动判断——这将验证“生平卷入度”作为调节变量的效力，同时限缩“最小保护”的独立解释范围；（2）工序保护相对松弛（田野时间长、方法强制弱、考核压力小），但研究者在长期浸泡中仍未发生被动判断——这可能是由于剩余经验烈度不足，或生平卷入度过低，或要件二的放弃从未被做出。两类阴性案例的追踪，是对本文发生条件的直接检验。

七、剩余经验能否被留住：回应两个最有力的反驳

一个有力的反驳是：学术共同体通过方法规范降低沟通成本、积累可靠知识，正是其专业性所在。你强调剩余经验和被动判断，是否在主张一种反方法论的个人体验主义？

这个反驳迫使本文做出最关键的澄清。本文捍卫的判断力，恰恰不是个人体验。个人体验是私人的、不可传递的、停留在感受层面的——那个在楼道里被抽烟沉默攫住的学者，如果她只是“感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就不会存在。被动判断所留住的那个临时空地，最终必须被写成一个可以被同行检验、批判、改进的新命题——她在那张白纸上写下的“非协商性共在”，在三年后出版的论文里变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有定义、有边界、有可判别的案例类型、有对“协商治理”理论有效边界的明确限制。它不是私人感受，而是从剩余经验里逼出来的新知识——但它发生的条件，确实不是更精细的方法，而是那段没有被工序保护住的不安全间距。

反驳可以再进一层：你说研究者要自己承担代价，但如果制度不提供任何保障，只有那些有经济安全网的人敢承担——有教职安全的老教授、有家庭经济支持的年轻精英——你的“被动判断”最终只对精英学者开放。这不是反方法论，这是反民主。你的理论是否无意中为知识生产的不平等做了辩护？

这个反驳必须被正面接住。是的，承担可核算损失的能力与社会位置高度相关。一个在非升即走倒计时最后一年的讲师，和一个已获长聘的教授，在“敢不敢多花一年等一句话”这件事上的余地，完全不同。本文的理论确实无法回避这个推论——但必须在此把追问分岔。一阶追问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承担风险’的能力？”这个追问的答案在制度层面——松绑、增加保障、降低发表压力、为非升即走考核设置更长的周期和更多元的评价指标。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本文不反对它们，也无意声称它们无效。但本文工作在二阶追问上：“即使制度给了所有人完全相同的工序条件——田野时间充足、发表压力松弛、方法强制弱——在那些工序条件里，剩余经验真正到场了吗？判断力就一定会发生吗？”

这是制度批判的盲区。制度批判假设：只要绳索松掉，所有研究者都能平等地获得判断力的解放。但工序分析揭示了一个更深的陷阱：绳索松掉之后，那道工序里还有更隐蔽的保护操作在运转——更高效的编码、更聪明的补丁、更体面的“局限”——它们不需要任何制度压力就能独立运作，因为它们已经被研究者内化为“专业素养”。一个没有发表压力的研究者，依然可以在写完一篇安全

论文之后，发现漏了东西，然后用一个更精致的补丁把它糊上——他不需要非升即走来逼他这么做，他只需要不想推翻自己刚写好的那篇得意之作。尊严、学术声望、被认可的欲望、对自己已完成的智力劳动的珍惜——这些心理能量，在制度压力退场之后仍然独立地支撑着“最小保护”的运转。它们不是制度强加的，它们是学术人自己带进工序里的。制度批判解决了“压力”的问题，但没有碰“自我保护的惯性”这个更深的膜。

因此，本文的结论不是“制度改革无用”，而是“制度改革的边界在哪里”。松绑可以让更多人有着稳定的工作与安全的收入，这是好的；但它不能替研究者完成被动判断的要件二——在那个渗出的剩余面前，选择不跑。这个选择，无论在什么制度条件下，都是一笔需要由研究者自己承担可核算损失的、不可被制度外包的私账。你可以把这笔账变小——通过延长考核周期、通过改变评价标准、通过让“不确定性探索”成为一项被制度认可的合法学术劳动——但它不会消失。因为搁置旧说的那一刻，花掉的不是制度给你的时间，是你自己不可逆的学术生命。这恰好解锁了那道来自正义感的反驳：如果少数人先承担了这个损失，而多数人仍因社会位置的不利而无法承担，那么不平等地发生出来的被动判断，本身会不会是新的知识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本文对此的回答是不回避的：在当下制度条件尚未改变的阶段，被动判断的发生确实依赖于研究者各自带进工序的不同的“可担损资本”——经济的、职位的、导师的、家庭的。这种依赖不是本文在辩护的常态，而是本文在诊断的病灶。当“不亏本裂缝”的宽度与“生平卷入度”的深度共同决定被动判断的发生概率时，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知识生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正在运行的筛选机器。它让那些本就拥有更多裂缝的人更有机发生判断，让那些裂缝最窄的人最安全地生产安全知识——而这不平等本身，恰恰说明最小保护不是一根均匀施压的平整面板，而是一面对每个人开合不同的过滤网。诊断它的运作，是改变它的第一步。

但还有另一个反驳，它比专业主义反驳更根本、更需要被正面击穿。它可以被称为强回收论。这个立场的完整形态如下：制度压力并非只在事后压制研究者的表达——它通过长期的、弥散性的规训，已经内化并重构了研究者的认知结构本身。研究者在经验发生的当场，就已经“自觉地”“本能地”过滤掉了那些不安全的、可能会带来麻烦的材料。这种过滤不需要经过“安全知识做满一发现剩余一感到不安”的阶段；它在知觉的门槛处就直接被拦下了，因此研究者根本不会感受到任何“剩余”的痛苦。你不是说研究者需要被剩余经验逼出被动判断吗？如果他们的认知已经被规训到了“感知不到剩余”的程度，那么这道工序从一开始就没有“剩余”可以到场。

这个反驳直接冲击了本文的整个发生学前提——被动判断需要剩余经验，而剩余经验需要感知到剩余。如果规训深到连“不舒服”都没有了，那么本文的诊断——最小保护通过绕开剩余来阻止被动判断——就失去了操作基础。因为此时没有东西被绕开；研究者的整条经验生产线，从原料到成品，都已经在规训的炉膛里被重塑了。本文对此的回应分为两步。

第一步，本文所定义的“剩余经验”，其发生学特征恰恰是被安全知识做完之后才被逼出——它不是研究者在田野当场“感知到”的，而是研究者在离开田野、写完论文、交完初稿、用尽了全部安全处理之后，才发现有东西没有被处理掉。因此，即使研究者在经验发生的当场“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他可能确实在采访时没有不安、在编码时没有犹豫、在写稿时没有卡顿——这并不构成对剩余经验存在的反证。剩余经验的“剩余性”，恰恰要以安全处理的“完整性”为前提：处理得越完整、越干净、越安全，剩余的溢出才越有理论意义。如果研究者从未使用全套安全工序去封口，那么

剩余就从未被真正检验过。一个从未被逼到旧说边界的人，没有资格宣称“我没有剩余”——她只是还没走过那道工序的尽头。剩余不是“当场感知”，是“事后洗不掉”。

第二步，如果规训真的深入到了“连事后洗不掉的剩余都消失了”的程度——即研究者不仅在当场没有感知，而且在安全知识做满、工序完整走完之后，仍然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渗透、没有任何“擦不掉的东西”——那么本文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判断确实不可能发生。但这是对本文机制的无条件确认，而非反驳。因为它恰好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命题——不是制度压力直接压制了判断，而是判断发生的条件（剩余经验到场）被系统性地消除了。那种“毫无痛苦地完成安全研究并对此毫无察觉”的状态，正是本文所诊断的“不发生”的典型形态——它不是在反驳本文，它在为本文提供最精纯的阴性证据。唯一需要补入的审慎限制是：在规训深度达到“连事后洗不掉都消失”的极限状态时，本文所假定的“被动判断的发生学起点”（安全知识做满后剩余渗出）可能被更激进的发生学起点所替代——不是“被逼出”，而是“从未有任何逼出的可能”。本文目前的工序分析，在解释这种极端状态时，需要补入关于“规训本身如何取消剩余经验的生成条件而非仅阻止其到场”的更深层论述。这一层，超出了本文现有的理论边界，但它是本文所开启的发生学分析必需的下一站。

八、结尾：保留一小段不安全隐患

本文可以被证伪的情况如下：能否观察到这样一批进入学术系统满五年的研究者，他们持续地、主动地在既有研究工序中保留一段不被安全处理所保护的间距，系统地记录自己在工序中经历的“安全知识已做完但经验仍在渗透”的片段，并且其后续发表的核心论文中出现了清晰可辨的、源于这些片段的被动判断痕迹；在此情况下，若五年跟踪数据表明：这批研究者的核心论文影响力与留在保护工序内的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优势、甚至更低，那么本文所坚持的“剩余经验到场是判断发生的条件机制”这一论点，即可以被审慎质疑——也许安全的工序本身也可以酿出同样锐利的东西，而本文所论述的那段不安全的停留，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殊偏好。本文预判阴性案例最可能出现在两类情形：

（1）工序保护高度严密、但研究者因极深的生平卷入被逼出被动判断——这限缩“最小保护”的独立解释力，验证“生平卷入度”的调节效应；（2）工序保护较松弛，但研究者在长期浸泡中仍未发生被动判断——可能因要件二的放弃从未被做出，即“不跑”这一步并未发生。两类情形的经验追踪将是对本文发生条件的直接检验。

本文落回到那个具体的动作上：保留一小段不被安全处理所保护的不安全隐患。它不在制度改革的蓝图里，不在方法论教科书的清单里，不在职称评审表的格子里。它在一个学者深夜面对自己日记、发现刚写完的论文漏掉了什么、然后关掉正在修改的文档、铺开一张白纸的那一刻。那个动作不是勇敢。它只是没让那个东西滑掉。

注释

参考文献

- [1] 本文所涉田野案例均源自笔者及同仁的真实研究经历，其中“楼道抽烟”案例以第一人称自述形式呈现，已获当事人知情同意进行学术使用并做匿名化处理。它为论证“被动判断”的概念结构提供了清晰的内部剖面，作为思想例示支撑理论展开。本文提出的可裁决判据与阴性案例检验方案，才是对其发生机制的实证检验路径。
- [2] 本文使用的“不亏本”为分析性隐喻，用以描述制度对研究者时间与精力的核算机制——如中国高校通行的预聘—长聘制考核周期、课题制对结项成果的量化要求等——如何重塑研究行为，并不预设研究者纯粹经济理性人。
- [3] 阴性案例基于多位学者的真实经历合成并做匿名化处理，旨在展示最小保护工序在个体操作层面的完整运作，作为思想例示而非严格实证数据呈现。
- [4] 此“回收论”的完成形态可追溯至一个以判断力教育为核心的学术写作社群中由张琼撰写的《安全知识的代价》一文（内部交流，未正式发表），该文首次明确提炼出“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三条律令为制度绳索。本文在此基础上转向对判断力发生条件的追问，并在正文中以“自己主动构建的强回收论”形态与自己的立场正面交锋。
- [5]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体”（Immunitas）强调保护逻辑通过吸收威胁而反向吞噬生命，本文的“最小保护”则强调工序对剩余经验的提前绕行，两者在保护对象与运作机制上截然不同，判决性对照预测已列于正文。
- Bachelard, Gaston. (1938). *La formation de l' esprit scientifique*.
- Dewey, John. (1910). *How We Think*.
- Esposito, Roberto. (2002).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 Festinger, Leon.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Polanyi, Michael.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 Polanyi, Michael.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附论零·本组选篇说明（编辑增补）

本文属张琼 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投稿的两组共八篇：一组的原初问题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代命题」，另一组是莱克维茨的「独异性化」诊断。每组四篇（三个金点子+一次新典范涌现）。编辑逐篇通读评分后录取七篇，本文为其一。落选的一篇是《自噬性共生》——作者站上已有《自噬性适应》《改不动的机器》《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三个同族概念，而该文「系统把自身赖以产生新异的能力代谢为维持运转的养分」这一机制与《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几乎同构，自噬这条路径在本专栏已经走满，按站内近邻规则退出本组。其余七篇均按下文附论一的方式补切最近邻后发表。

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节由编辑增补，不属作者原稿。评分时按严格的全球库口径检索最近邻，发现本文有两个未被正文请上桌的对手；它们不削弱本文的判断，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主张必须先要在它们面前站住。以下逐条给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以及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判决性对照预测。

1. 杜威的「不确定情境」与探究的起点

它已走到哪一步。杜威在《逻辑：探究的理论》中确立：探究始于一个未被定形的、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情境，正是这种不安推动了整个探究过程。这是「判断从何而起」这一问题最经典的答案。

分离线。分离线在**探究者是主动进入还是被卷进去**。杜威的不确定情境是探究者**主动认领**的问题起点——不安一旦出现就被转化为课题；本文的剩余经验**不请自来**，且在成为课题之前就被安全知识处理工序消化掉，只有在工序失败处才留下痕迹。杜威解释探究如何开始，本文解释它为什么大多数时候没有开始。

判决性对照预测。追踪田野中不安事件的去向：杜威框架预测其主要转化为研究问题；本文预测在标准化程度高的项目中**绝大多数不安在被认领之前即被消化**，且被认领的比例随工序标准化程度单调下降。若认领率与标准化程度无关，本文的工序论没有落点。

2. 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它已走到哪一步。布尔迪厄要求研究者把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也变成研究对象，以此对抗学究谬误。这是社会学内部对「研究者如何不被自己的位置蒙蔽」给出的最系统的方法论回应。

分离线。分离线在**它是纪律还是意外**。参与性对象化是一套**可被教授、可被自觉执行的方法论纪律**；被动判断的定义特征是非自愿——它恰恰发生在纪律失灵处，是研究者被材料按住而不得不做出的临时切断。前者是能力，后者是遭遇。

判决性对照预测。比较受过参与性对象化训练与未受训练的研究者：若前者的剩余经验留存率与被动判断发生率**显著高于**后者，则「被动」这一属性被严重削弱，本文应改写为一种可训练的方法论能力；本文预测训练能提高**事后的辨认率**，但不提高**发生率**——两者应当分开测量。

附论二·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以下条目为编辑在增补附论一时核验，非作者原稿所引。

Dewey, J.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Bourdieu, P. (2003). 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9(2), 281-294.